

从农村基督教盛行看农民社会保障需求 ——基于豫西南H村的调查

杜晓田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盛行,反映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和公共活动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通过基督教,农民可以得到同信仰群体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在互助中抵御一定的生活和生存风险。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成员共同抵御风险的社会制度,农民一定程度上不能得到充分的国家制度性的保护,转而把基督教当作了重要的保护载体。因此,国家要大力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做真正的人民保护神。

关键词:基督教;农民社会保障;社会风险;需求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1)04-0043-04 **收稿日期:**2011-03-15

作者简介:杜晓田,男,河南邓州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发展。

一、文献回顾

吴理财、张良(2010)从农民精神信仰的缺少分析了当前农村基督教文化的盛行原因,及对国家基层政权权威的冲击,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丁忠甫(2007)基于皖中某村的调查,以新农村建设为基本背景,从基督教对当前农民的基本功能分为“遗传型”基督徒、“灵验型”基督徒和“传递型”基督徒。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满足农民精神需求,扩展公共活动空间,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满足贫弱阶层基本的物质需求,在农民的生活起居、医疗安全健康方面给予保障,这样当风险来临,当社会变化时,农民才不会惶恐不安,也才能有坚持不变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渐取代基督教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刘智华(2006)从社会历史、市场经济的随机性和基层组织的组织性三个方面总结了农村基督教盛行的原因,指出从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做好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对策思路,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农民抵御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有着宗教产生的自然基础^①。刘宇征(2010)认为农村宗教是农民表达对现实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应采取辩证态度看待农村宗教的盛行,加强宗教管理。由于人均占有资源不平衡,再加上个人能力有高低,机遇也有所不同,近年来,农村出现

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②。本文重点分析基督教中信徒们经常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源扩展的纽带,以特有的方式活动着。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一场突如其来的任何风险都足以使其掉入生存线以下。农民参与基督教的行为,不同于城市的宗教信仰,从其行为的本质而言,农民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互惠行为,以抵御社会风险为首要目的。

二、农村基督教的盛行

基督教^③作为西方的外来宗教,自唐朝时传入中国,曾多次遭到驱遣。自传入我国(初唐时的“大秦景教”)以来,至今在我国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基督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蚕食、文化奴役和思想牵制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团结各方面积极力量包括宗教界爱国人士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重新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政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将其写入宪法,恢复了宗教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已从改

^①广义的基督教分为三种,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一般说的是基督教新教,中国的基督教会可以分为三自基督教会和家庭教会,“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革开放初的 300 万猛增至现在的 1 亿左右, 其中 80% 的在农村。近年来, 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盛行, 反映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和公共活动的缺失, 同时, 通过基督教信仰的媒介作用, 信教农民可以得到小群体的帮助, 正是在互助中抵御一定的生活和生存风险。

本文是利用 2010 年暑假期间, 在本人的家乡河南省南阳市 H 村进行的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信仰基督教民众的特点和基督教文化盛行的根源, 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形式进行的。共发放问卷 130 份, 收回 126 份, 有效问卷 122 份, 有效率 93.3%。从被调查者的年龄看, 最小的年龄是 21 岁, 最大的 76 岁, 平均年龄 56.8 岁。各年龄段的分布为: 20-30 的 5 人, 占 4.0%, 30-40 岁的 11 人, 占 9.1%, 40-50 的 32 人, 占 26.2%, 50-60 的 40 人, 占 32.8%, 60-70 的 28 人, 占 22.9%, 70 岁以上的 6 人占 4.9%。从文化程度看, 最低的文化程度是文盲, 最高的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4.8 年。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的 86 人, 占 70.5%, 初中文化程度的 27 人, 占 22.1%, 高中文化程度的 3 人, 占 2.4%。从健康状况看, 曾经得过大病的 21 人, 占 17.2%, 经常有病的 25 人, 占 20.5%, 身体不太好的 38 人, 占 31.1%, 感觉身体还不错, 不经常生病的 28 人, 占 23.1%。从以上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出, 参加基督教的信徒年龄比较大, 这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密切的联系。史清华(2009)在大量的调查中的数据证明: 在 2002 年时, 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39.92 岁, 到 2003 年则增大到 42.67 岁, 到 2004 年则进一步升高至 46.38 岁, 上升速度相当惊人, 年平均增速达 7.78%。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 农户家庭留守人员的老龄化现象明显^[9]。更让我们值得警醒的是农村留守老人增多, 缺少家庭间子女的照顾, 国家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时不仅仅是物质帮助, 更应该加强组织文化建设, 老年服务工作更为紧迫, 利用农村村社已有的社会资源, 提供农村老人服务的可及性, 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程度比较底, 平均受教育年龄只有 4.8 年, 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从总体情况看, 身体不太好和曾经得过病和经常得病的比例占到了 68.8%, 农村合作医疗虽然部分缓解了农民生大病“看不起病”的问题, 但日常的医疗服务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需要。并且, 基督教小故事里经常宣讲的可以治愈疾病的事例就吸引着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

参与到基督教中, 希望通过信教治愈自己的疾病。

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统计见下表(多选, 有效比例之和大于 100%)。

参与宗教活动动机	人数	有效比例
看到周围信教的人很友善, 农闲时自己在家没事干	18	14.7%
参加成员可以得到生产和生活上的帮助	36	29.5%
突遇困难时, 可以及时得到救济	27	22.1%
信仰基督教可以强身治病	41	33.6%
参加基督教, 使自己感到精神很充实	23	18.8%
文化生活贫乏, 找人说话	34	27.9%
其他	16	13.1%

从以上参加基督教的原因的调查中的可以看出, 因为生活上的互助和强身治病的比例占到总数的 85.4%, 侧面表明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强烈的社会保障需求。

三、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增加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

1. 社会风险的增加

随着人类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现代化的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财富, 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活质量, 也给人类带来了不断膨胀的风险, 风险社会下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卷入其中。当然, 农村居民也概莫能外。风险社会的特点有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隐蔽性、风险的快速传递性、风险可能的平等性和风险后果的不平等性。在应对风险的后果时, 财富的多寡, 应对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越是贫穷的人群^[10], 其生存环境越恶劣, 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多, 造成损失的相对程度也越大。农村居民在财富的占有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 具有明显的弱势地位。例如, 在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 城市的污染物大量转移到农村地区, 造成了土地、饮用水、空气的严重污染, 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健康, 由于污染的普遍性, 受害居民很难有效组织起来获得赔偿, 这或许可以从农民获得救济的途径有限或者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得到解释^[11], 但是, 身处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是最大的一个受害群体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到国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了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1956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做了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的社员, 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 保障他们的吃、

穿和柴火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社员在劳动中的安全,不使孕妇、老年和少年负担过重和过多的体力劳动”,“对于遭受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员,合作社要酌量给以补助”^①。在合作化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可以得到集体的基本有效保障,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对经历过合作化时期老人的访谈,也证明了合作化时期农民的生活困难,老弱群体都可以得到集体的帮助。并且,除了集体劳动外,集体活动非常丰富,天天唱着“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现在丰富多样,但精神生活是快乐的、充实的。向往着毛主席描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到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重要会议,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土地以人为基数进行了均分,集体的农具等各项公共财产都进行了“瓜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激励,农村经济和大部分农民的物质生活在短短几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集体的瓦解,使农民的社会保障又回到了农业封建社会时期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阶段,疾病、老年、意外事故等风险主要靠家庭成员的分担。

然而,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保障已不同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保障。(1)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集中生产与消费为一体,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家庭成员必须互相依赖,才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封建社会下,严格的户籍管理约束人员的流动。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动下,社会人员的流动是必然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严重削弱了过去的稳定的家庭结构,从而造成了家庭成员间相互照顾的体系难以维持。(2)道德约束力的下降。传统的伦理道德是维系家庭保障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孝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血缘地缘范围之内,“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着村民的行为,任何违反惯常的行为都会受到宗族、邻里的舆论谴责而得到约束。孝敬父母为最大的美德,任何村民都不敢贸然违反这样的道德规范而被孤立。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现在的农村社会已经进入“半熟人社会”,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频繁,也逐步改变了村民的价值体系,市场经济的“唯利益至上”改变了传统道德规范的权威地位。许多农村地区的“抛弃老人”现象的频发引起了我国对重建中华传统道德的现实困

境的思量。(3)子女数量的减少。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前提。第五次的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村平均家庭规模是3.65人,而在1980年农村人均家庭规模为5.54人,1985—2000年农村家庭负担老人系数由7.79%上升为10.95%^②。因为子女的数量比较多,每个子女成年以后的发展能力不同,家庭差异性比较大,在诸多子女中,总有可能有1、2个孝顺或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为家庭成员间的互助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基础。能真正为父母提供可靠养老的子女数量也相对减少,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无人抚养的老年人。因此,人口数量的减少,为国家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国家理应为少孩子或没孩子抚养的老人提供全部或部分的养老资源。(4)农村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子女本身的收入有限。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分布,决定了农村孩子从小就不能和城市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环境和资源,成年以后,无论是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走他乡,在城市谋生。农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按照人们对产出的贡献支付报酬,根据市场分配法则,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是根据各要素的稀缺程度来进行的,稀缺要素的边际产出大,其所有者就会取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而充裕要素的边际产出小,其所有者得到的收入水平就较低,对于同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要素的质量来进行,因此,对于劳动力这种要素而言,劳动者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就成为影响人们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农村无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是充裕的,决定了他们得到的收入水平是最低层次的。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比上年增长5.7%。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1200至1600元的占33.9%。在这样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下,他们还要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做积蓄,就没有更多的剩余财富来供养老人^②。

2. 农村国家制度性社会保障供给的不足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发展目标,2007年在全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截至2008年底,已有1982.2万

①史敬堂等.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下册)。

②我国有近2.3亿名农民工月平均收入1417元,新华网,2010-03-23。

户、4305.5万人得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加739.2万人,增长了20.7%。然而,从各省情况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供给能力差异较大,供需缺口很大⁷。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低保对象的甄选过程中,低保对象的确定转化为村组干部治理的手段,确定自己治理权威的工具,出现了获得低保人群中的“关系户”,“福利户”的现象⁸。获得救助的村民把国家的救助看成是村干部的施舍和照顾,使国家有限的救助资源转化或流失,农村社会安全网的构建难以奏效。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8年已经提前实现了全覆盖,但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保大病的原则。2009年开始在全国10%的县实行的全国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是普惠型的国家制度安排,给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障带来了希望。然而,邓大松、薛惠元根据新型养老保险的基本方案,通过建立养老保险精算模型,测算的老人的新农保的替代率是13.86%。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现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现了全覆盖,“老人”也无法依靠新农保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四、基督教教义与社会保障理念的契合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德国1883年颁布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的《工伤事故保险法》和1889年颁布的《老年和残障保险法》等一系列社会保险法规为标志,到现在只有120多年的历史。然而,社会保障思想源远流长,西方基督教的救苦救难的宗教思想,耶和为了救渡世人的苦难,把自己的身体定在了十字架上,世人皆兄弟姐妹,互相关爱,互相团结,这些基督教的教义与社会保障的救济贫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水平,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准则等思想的契合,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在国家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水平有限,未能有效的抵御农民所面临的生活和生存风险时,基督教不断本土化,迎合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从而得以在农村地区盛行。教徒遇有重大疾病,报告教会,教会负责人就会到家探访,根据家境情况给以资助,如果遇到农忙季节,还经常会有爱心教徒无偿提供帮助,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通过口口相传,信仰基督教的好处就会得到广泛传播,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家庭贫困户经济可以得到教徒的各种物质帮助,基督教经常以小故事的形式宣传爱心行动,为贫困户送米、送

面、送菜,冬天的时候送面被等等,使这些处于生存线挣扎的人感受到温暖,并且是以信教而得到的帮助,会更坚定相信基督教的好处。

五、结论与启示

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整套信仰体系作为支撑。农村的基督教的传播途径和根源不同于城市地区,宗教对价值信仰的支配作用在农村基督教徒中的地位不是很明显(见本文表格)。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功利、实用心理。基督教中,有许多关于耶稣神迹的传奇故事,如他治愈患病者,给饥饿的人食物,使残疾人康复,救活濒临死亡的孩子等等,许多穷人、病人、残疾人、妇女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被耶稣神奇般地救活,这给在现实生活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带来希望。当底层农民越来越依赖基督教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物质上救济与帮助的时候,农民就会将权威认同由基层政权转向神权,忠诚依附于基督教组织,这对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权威基础不能说不是一个挑战甚至讽刺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农民公共活动的空间,因为作为社会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乃人之本性需要。在没有国家组织提供的公共活动空间时,其他组织形式便会乘虚而入,影响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权威地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国家在健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的同时,要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真正实现国家的社会保障成为农民生活依靠的“安全网”。✿

参考文献:

- [1]刘智华.关于我国农村基督教发展的思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7-70.
- [2]颜敏.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复兴与农民的精神需求[J].唯实,2003(9):28-31.
- [3]史清华,卓建伟.农村土地权属:农民的认同与法律的规定[J].管理世界,2009(1):89-96.
- [4]张奇林,张兴文.风险社会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及危机[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17-21.
-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6]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中汉经济研究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88.

(下转 52 页)

- [7]丁元竹.我国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初步评估[J].开放导报, 2009(12):34-38
- [8]贺雪峰.农村低保缘何转化为治理手段[J].中国社会导刊, 2008(3).
- [9]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J].人文杂志,2010(2):175-181.
- [10]贺书霞,王征兵.突破最低生活保障农业的思考[J].农村经

济,2010(7):12-16.

- [11]丁忠甫.农村基督教扩展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以皖中 S 村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73-76.
- [12]郑风田,阮荣平,刘力.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J].经济学(季刊),2010,9(3):830-851.
- [13]杜晓田.基督教传入韩国对儒学传播的影响[J].科技信息, 2010(32).

Analysis of Demand for Social Security of Peasants from Christianity Prevailing in Rural Areas: The Survey in Village-H in Southwest of Henan

DU Xiao-tian

(Normal University of Hena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Xinxiang, 45300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s in vogue in rural areas, reflecting the lack of rural cultural life and public events. More importantly, farmers can get with faith groups material to help and comfort, 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gainst certain life and survival risk.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 kind of social members against the social system of common risk to a certain extent, farmers can't get enough,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turn then Christian as a important protective carrier. Therefore, the nation will be vigorously improving farmers' social security level, as the real protector of people.

Key words: Christianity; Social security of peasants; Social risk; Demand